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郑杭生

Non-routine Action & Its Consequences:
A New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Theory

非常规行动及其后果

一种社会变迁理论的新视域

张兆曙/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Non-routine Action & Its Consequences:
A New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Theory

非常规行动及其后果

一种社会变迁理论的新视域

张兆曙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规行动及其后果：一种社会变迁理论的新视域/张兆曙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社会学文库/郑杭生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300-11359-3

I．非…

Ⅱ．张…

Ⅲ．社会变迁-研究

Ⅳ．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8575 号

社会学文库

主编 郑杭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非常规行动及其后果

一种社会变迁理论的新视域

张兆曙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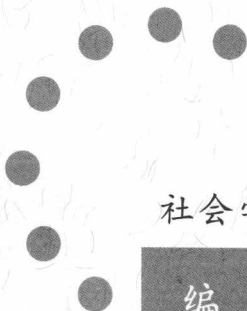
印 张 12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6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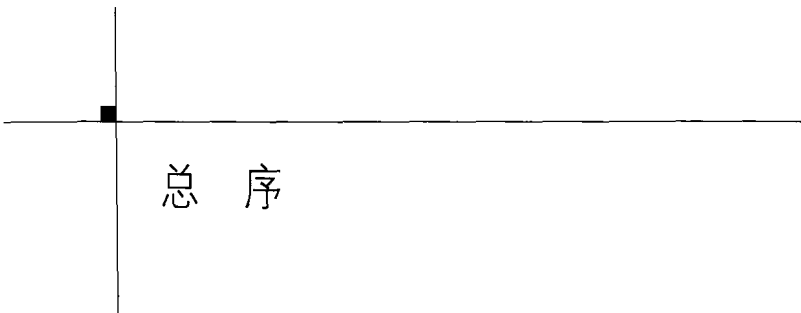
社会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郑杭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海	王思斌	王雅林	包智明	田毅鹏
孙立平	刘少杰	刘世定	刘祖云	关信平
庄孔韶	江立华	李培林	李 强	李路路
苏国勋	沈关宝	宋林飞	吴忠民	张 静
周晓虹	洪大用	侯钧生	郭于华	郭志刚
黄 平	景天魁	景 军	蔡 禾	潘绥铭
戴建中				



总 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

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

注中国社会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

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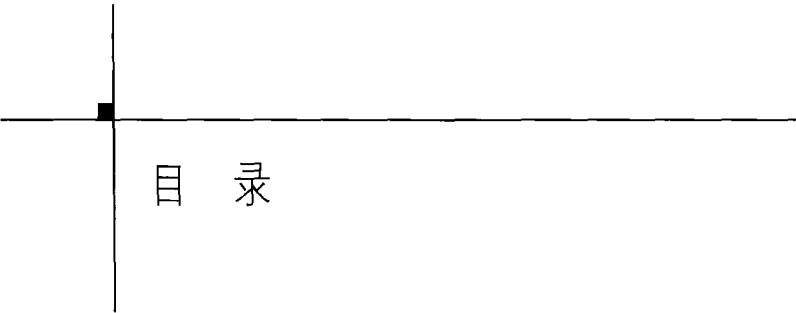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

郑杭生

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



目 录

导 论 / 1

- 一、理论的追问与非常规行动概念的提出 / 3
- 二、非常规行动的类型学与形态学考察 / 13
- 三、非常规行动的普遍化与常规化 / 22
- 四、本书之篇章架构 / 33

上 篇

第一章 社会行动概念的典范 (一): 规范行动与失范行动 / 41

- 一、涂尔干的规范行动与失范行动 / 41
- 二、默顿对涂尔干失范理论的发展 / 62
- 三、规范行动与失范行动的理论得失 / 81

第二章 社会行动概念的典范 (二): 合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 / 93

- 一、韦伯的概念工具与基本命题 / 93
- 二、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行动理论的改造 / 117

第三章 社会行动概念的典范 (三): 例行化行动或常规行动 / 159

- 一、吉登斯的概念工具: 例行化行动及其可能性 / 159
- 二、吉登斯的基本命题: 社会整合与社会变迁 / 180
- 三、吉登斯的贡献与缺陷 / 199

下 篇

第四章 非常规行动: 一个概念框架的提出和构建 / 215

- 一、非常规行动概念的提出 / 215
- 二、考察非常规行动的两个维度 / 242
- 三、非常规行动的社会形态 / 260

第五章 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 /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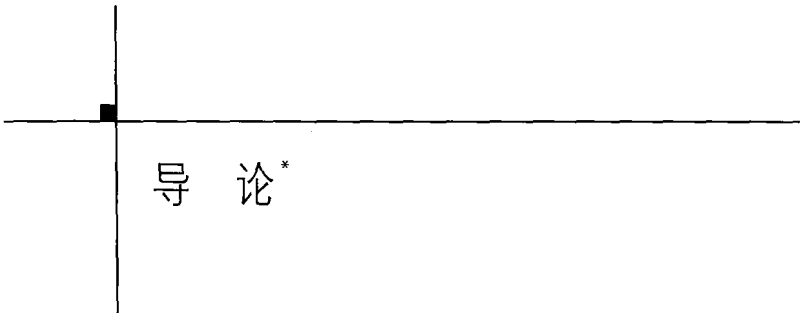
- 一、非常规行动的普遍化与常规化 / 273
- 二、非常规行动的普遍化、常规化与社会变迁 / 294
- 三、社会变迁的节奏和时间特征 / 313

第六章 非常规行动理论的当下意义 / 328

- 一、非常规行动视野中的改革与创新 / 328
- 二、非常规行动视野中的社会转型 / 344

参考文献 / 359

后记 / 369



导 论^{*}

本书论及的核心议题是非常规行动的概念以及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所谓非常规行动 (non-routine action), 就是行动者在安排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不按套路 (或常规) 出牌”, 或者在例行化的行动程序和路径之外“另起炉灶”。尽管非常规行动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但向来注重社会行动研究的社会学对此反而缺乏应有的敏感与理论上的把握。中外社会学家们构建了一系列经典的社会行动概念, 却没有一个概念是指向“非常规行动”的。如果一定要在社会学理论中找到一个与非常规行动比较接近的概念, 只有默顿讨论的“革新” (innovation)。但默顿的这个概念属于失范行动的一种类型 (参见 Merton, 1938)。失范行动与非常规行动并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 前者以社会的公共性要求和制度化手段为衡量标准, 特征是就社会 (规范) 论行动 (参见渠敬东, 1999a); 后者则是就社会行动展开的程序和路径而言的, 讨论的是社会行动的实践状态和组织方式。现代社会学比较注重与“非常规行动”相对应的一种行动方式, 吉登斯称为“常规或例行化行

^{*} 本书导论的主要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题目为《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 一个社会学的新概念与新论题》。

动”(routine action),布迪厄则叫做“惯习”(habitus)。在他们的理论中,“社会何以可能”完全仰仗日复一日的例行化行动(或惯习)与结构之间的相互建构和形塑。而例行化行动之外的非常规行动则被忽视了。

不过,社会科学的某些成果还是为我们展开非常规行动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资源。演化经济学将经济生活中的非常规行动称为变异或创新(Foss, 1994; Dosi & Nelson, 1994),并认为它对于推动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库恩把科学研究中的非常规行动叫做“异例”,他认为在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更替中,“异例”对前范式的挑战和颠覆以及对新范式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参见Kuhn, 1970)。美国社会学家克菲阿特则直接关注亚文化和反文化群体中的非常规生活方式,认为非常规生活方式主要是青年人对父辈以及主流文化的抗争和颠覆,并促使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和社会文化模式的再生(参见Kephart, 1993)。这些研究展现了非常规行动在各个特定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性,但未能把它引入更普遍的社会生活中去,也未能放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状况中加以考察。可喜的是,近来学界对技术创新的相关讨论为非常规行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启发。冯鹏志把技术创新设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并以行动主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参照框架,探讨这种特殊社会行动的内涵、目标、生成、特征及外部影响(参见冯鹏志, 1997)。不过,从行动的实践状态和组织方式来看,技术创新的特殊性应该在于它的非常规性。因此,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最需要揭示的是它的非常规性及其更普遍的生活意义、思维意义和社会意义。

总之,尽管学术界对非常规行动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铺设,但仍然没有足够地重视,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积累。本书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下,充分吸取社会学对其他社会行动类型的研究经验,将演化经济学、科学史、亚文化群体以及技术创新等特定领域的非常规行动研究推及更普遍的社会生活中进行挖掘和探讨,把长期被社会学所忽视的非常规行动带回社会学的视野,为非

常规行动在社会学理论中谋得应有之席。同时,从社会行动的角度看,任何意义上的创新和改革都应该属于非常规行动的范畴。如果我们的创新和改革不能超越过去的常规或惯例,仍然按照常规的方式安排社会生活,那就只能延续过去的困境或落后的局面。中国近30年的改革成果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非常规行动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尽管我们不断强调创新,却又缺乏容忍“异端”、“另类”等非常规行动的社会思想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对非常规行动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把握,为非常规行动正本清源。

一、理论的追问与非常规行动概念的提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不同社会学流派和理论阵营的基本格调,社会学理论每一次重大的进展也都意味着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发现和理解。但是,无论是不同流派的理论面相中,还是不同阶段的学术使命中,都隐喻着或直接揭示出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建构性。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在相互对立的同时也在相互建构着对方。但是,我们对行动与结构的互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于一般抽象的认识,而应该分别从两个具体的维度做进一步的追问:在社会结构再生产与社会结构变迁(或新结构的生成)这两个过程中,行动与结构是如何相互建构的?或者说,社会结构分别建构出了何种将会导致结构再生产和结构变迁这两个不同过程的社会行动?

从结构再生产的角度看,社会互构过程意味着被结构所建构(I)的行动反过来又建构(II)了结构。其中,第一个建构(I)过程意味着,行动受制于社会结构内涵的某种要求,第二个建构(II)过程就是结构再生产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仰仗符合结构性要求之社会行动的反复发生与绵延,再现、复制、强化和巩固社会结构及秩序。显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结构是一种缺乏变动的、持久的和恒在的结构,它具有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特征,不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变化。这个行动化的结构与结构化的行动之间的互构关系表达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原则，即社会结构的稳定与连续性是由那些符合结构性要求的行动来实现的。至于这种“由结构而生，并支持结构再生产”的社会行动是一种什么样的行动，在社会学的理论宝库中不乏精确的概念。涂尔干^①笔下的规范行动就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吉登斯的例行化行动也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秩序的概念工具。但是，如果从社会结构变迁和新结构生成的角度看，对上述追问的回答就比较麻烦了。

（一）社会互构中何种社会行动建构了新的结构

就社会结构的变动性而言，社会互构中的行动，一方面与当下的结构存在着关联，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新结构的生成。那么，导致了社会结构发生变动或建构了新结构的行动，显然与结构再生产中的行动，应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原因很简单，巩固和维护当下结构的社会行动是无法建构出新结构的。但是，这种生于当下结构又促成结构变动的行动，在中外社会学的理论遗产中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一如哈贝马斯所言：“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释社会（结构）进化或者哪怕仅仅是相应的构想”（〔德〕哈贝马斯，2000a：123）。哈贝马斯所言自然有为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铺垫的意味，但是当我们检讨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确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社会行动概念作为解释工具。

将失范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勾连起来是社会学的一种常规认识。按照默顿的分类图式，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失调及其对个体影响力的崩溃，引发了失范行动的发生：行动者要么借助非制度化的手段实现目标，要么做一个形（手段）合而意（文化目标）不合的傀儡，要么隐退于大千世界，要么干脆通过反叛来重建社会文化结构（参见 Merton，1938）。由于失范行

^① 在本书所使用各处文献中，对法国社会学家 Durkheim Emile 的译名有两种，即涂尔干和迪尔凯姆。为了表述的一致性，本书统一使用“涂尔干”译名。

动本身包含了对社会结构的某种不满甚至重建要求，失范行动确实具有促进社会结构变迁的潜在或现实的力量。不过，当我们认真检视失范行动的社会遭遇之后，很难在社会变迁与失范行动之间进行简单的化约。

失范行动的第一种社会遭遇是被拨乱反正。按照涂尔干的见解，“任何失范现象如果触犯了集体意识的存在基础和整合逻辑，共同体就会以‘反常’、‘病态’或‘失范’的名义对其进行摧枯拉朽般的围剿和扫荡”（渠敬东，1999a：288）。即使默顿把失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文化结构内部的失调，他对失范行动所持有的态度也仍然是控制而不是重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他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指出：“我倾向于相信我们所向往的必需的制度常常不过是我们已习惯了的制度”（参见默顿，2001：305）。这表明，失范行动恰恰强化了被破坏的、被挑战的社会行动准则，或者重新明确了社会规范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结构还是观念结构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因为任何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差异、张力和矛盾都随着对失范行动的改造和剿灭而消失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甚至否定了社会行动与结构变迁的关联，而把社会结构的变迁归因于结构体自身（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变化（参见〔法〕涂尔干，2000：219）。

失范行动的第二种命运是借助规模化的效应颠覆了某种既存秩序。这实际上是冲突论的题中之意，也就是通过失范行动（特别是默顿所说的反叛）中反抗力量的积累，以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方式颠覆现存的价值、制度与结构。这的确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表象，但是完全把社会结构变迁理解为这种失范行动的颠覆，难免有失偏颇。如果社会变迁只能以这种途径发生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的变迁史就只能是一部血雨腥风的造反史。社会变迁断然不会完全是以这种方式推进的，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绵延中，人们可能根本感受不到这种剧烈的动荡过程，只是在不经意地回首中，才发现某种新颖和陌生的事物已经取代了日常生活所固有的东西，根本的社会变迁已经形成。而这种变迁与失范行动没有任何关联，这个过程的发生似

乎另有一套知识库存。

失范行动的第三种社会遭遇涉及默顿所说的“违规行为”(aberrant behavior)。违规行为并不具备“反叛行为”^①那样的“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Institutionalized Evasions of institutional rules): 努力避免公众的注意力; 违规者清楚所违反的规范的合法性, 但视这种违法为必要的手段; 尽量逃避现存规范的惩罚, 并不想提出替代性的规范; 违背规范是为了达到个人私利; 违规者没有重建价值、道德和秩序的要求(参见[美]默顿, 2001: 82~84)。由于匿名、隐蔽、散布和非对抗性, 这种行动方式难以受到集体意志的彻底围剿和拨乱反正; 同时由于抱负的缺失和手段的纯技术化倾向, 它也不会汇集成一股颠覆的力量。显然, 我们无法在这种失范行动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人为地搭上联系, 它的存在具有一种统计学上的概率特征, 任何社会都无法清除它。如果一定要说这种失范行动具有导致社会变迁之潜力的话, 这种潜力也最多表现为地方的、局部的和亚群体意义上的, 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维持来说, 它显得无足轻重。

显然, 失范行动这个概念工具并不能为社会结构变迁提供足够的解释力, 只有把失范行动理解为具有颠覆与重建使命的社会冲突的行动式样后, 才能勾画出所有社会结构变迁图景中的一条革命的路线。但是这种理解显然是片面的: 一方面, 失范行动并不全然具有革命的抱负; 另一方面, 社会结构变迁也不全然是一种革命的过程和反面推进的形象。正因为如此, 失范行动在社会学理论中只能沦为一种“边缘概念或小角色”(渠敬东, 1999b: 30), 这并不是它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 而是它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对于社会学所关怀的秩序和变迁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或许正是这种限制, 才导致了其他社会学家面对“社会互构中何种社会行动

① 这种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行为, 默顿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中称之为“反叛”, 而在《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一书中默顿则将其称为“非遵从行为”(参见[美]默顿, 2001: 82~90)。